

# 蘇聯的人口移動

張均然

## 壹 蘇聯人口增加情形

今年八月十八日「莫斯科新聞」(Moscow News)週刊報導，蘇聯第二億五千萬個公民已於八月九日出生。

關於蘇聯人口增加情形，可以下表列示：

年 度	人口總數 (單位：百萬)	資 料 來 源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卅一日	一五九·二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八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一日	一九四·一	Moscow News。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	二〇八·八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	二四一·七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	二四八·六	
一九七三年八月九日	二五〇	

蘇聯人口陰盛陽衰。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蘇聯女性人口為一億三千三百六十萬，男性人口為一億一千五百萬①。計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一千八百六十萬。根據蘇聯之報導，這一差數目前正逐漸減小而移向年齡大的人口。如果一九五九年四十六歲以下的人口女性比男性多七百四十萬，那麼一九七三年在此一年齡範圍之男女人數相等②。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蘇聯舉行第五次人口普查，根據蘇聯中央統計局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發表的該次普查結果第二次報告，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一九七〇年的人口統計數字如下：

共和國 別	人口總數 (單位：千人)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七〇年相 當於一九五九 年時之百分比
全蘇聯	二〇八八二七	二四一七二〇	二四一七二〇	一一六
俄羅斯聯邦	一一七五三四	一三〇〇七九	一三〇〇七九	一一一
烏克蘭共和國	四一八一九	四七二二六	四七二二六	一一三
白俄羅斯共和國	八〇五六	九〇〇二	九〇〇二	一一二
烏茲別克共和國	八二六一	一一九六〇	一一九六〇	一四五
哈薩克共和國	九一五三	一二八四九	一二八四九	一四〇
喬治亞共和國	四〇四四	四六八六	四六八六	一一六
亞塞爾拜疆共和國	三六九八	五一一七	五一一七	一三八
立陶宛共和國	二七一	三一二八	三一二八	一一五
摩爾達維亞共和國	二八八五	三五六九	三五六九	一二四
拉脫維亞共和國	二〇九三	二二六四	二二六四	一一三
吉爾吉斯共和國	二〇六六	二九三三	二九三三	一四二
塔吉克共和國	一九八一	二九〇〇	二九〇〇	一四六
亞美尼亞共和國	一七六三	二四九一	二四九一	一四一
土爾克曼共和國	一五一六	二二五九	二二五九	一四二
愛沙尼亞共和國	一一九七	一三五六	一三五六	一一三

根據今年八月十八日「莫斯科新聞」之報導，蘇聯城市與鄉村人口的統

計數字如下：

年 度	城 市 人 口 (單位：百萬)	鄉 村 人 口 (單位：百萬)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卅一日	二八·五	一三〇·七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一日	六三·一	一三一·〇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〇〇·〇	一〇八·八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三六·〇	一〇五·七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	一四六·一	一〇二·五

蘇聯自己稱，蘇聯一九三九年的城市人口比一九二六年增加一倍，而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七三年城市人口增加二點四倍。在過去二十年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加超過三百萬人。蘇聯超過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在一九五九年有二十五個，而一九七三年初增至三十五個，其中十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一百萬<sup>③</sup>。

## 貳 蘇聯的人口移動

從上面蘇聯城市與鄉村人口的統計表來看，蘇聯的城市人口不斷急速增加，而鄉村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鄉村人口的大量流向城市導致蘇聯農業勞動力的不足。這一嚴重問題，近年來引起蘇聯國內人口學家、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普遍注意。

蘇聯幅員遼闊，要研究蘇聯全部鄉村人口移動情形殊非易事。本文僅以新西伯利亞省、加里寧省克拉斯諾汗斯克區與諾沃哥羅省史達羅魯斯克區（後兩省均在莫斯科之北方）為研究對象。毫無疑問的，新西伯利亞省是整個西部西伯利亞的典型，而且在頗大程度上亦是蘇聯其他鄉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區的典型。同時克拉斯諾汗斯克區與史達羅魯斯克區也是各該省之典型。

### 一、移民的年齡、教育與職業結構

青年離開鄉村的人數最多，尤其是年齡在十五至廿四歲之間的青年。同

時青年所受的教育水準越高，就越想離開鄉村前往城市。大部分的青年到城市去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學業——就讀普通教育學校（即中等學校）、中等技術學校、職業技術學校與高等學校。在很多情況下，不遷移到城市而想繼續升學，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新西伯利亞省的青年年齡在十九歲而繼續居住於鄉村的，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出生者為五十八點四%，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出生者為五十二點二%，而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出生者為四十點三%<sup>④</sup>。

青年的大量外流不僅導致鄉村人口的減少，而且使鄉村人口老化。例如，在新西伯利亞省，自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九年間鄉村人口減少十四%，勞動力減少二十四%，兒童人數減少七%，而退休年齡之人數增加十二%<sup>⑤</sup>。

但是在西伯利亞鄉村人口的年齡結構比起俄羅斯聯邦中部與西北部地區還是相當有利的。在克拉斯諾汗斯克區的鄉村人口，以一九六七年為例，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超過六十歲，同時年齡在二十至三十歲者只佔該區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sup>⑥</sup>。

人口移動大大降低了鄉村人口之教育水準。在克拉斯諾汗斯克區，八十一%從鄉村離去的人受過不低於七年級之教育，六十一%受過不完全與完全中等教育。而前來鄉村的人八十七%所受的教育不超過七年級。結果鄉村定居人口全部只有十點七%受過中等與不完全中等教育<sup>⑦</sup>。史達羅魯斯克區的移民的教育結構對鄉村也是不利的。如果離開鄉村的人七十九點三%受過不低於七年級之教育，而六十四點四%受過高等、中等與不完全中等教育，那麼前來鄉村的人七十點二%未完成七年級教育<sup>⑧</sup>。

居民所受的教育水準愈高，他的地區移動性就愈大。新西伯利亞的社會學家們稱之為「可能的移民」，就是指那些剛在鄉村住下，就已經決定遷移的人。他們所受的教育比其他鄉村居民，尤其是比鄉村定居居民要高。在固定的鄉村居民成員中，受過六年級教育的人佔大多數，其比例佔全人數的七十三%。可能的移民大多數受過更多的教育，尤其是那些想移居城市的人<sup>⑨</sup>。

蘇聯研究人口移動的人都強調離開鄉村的機械人員特別多。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六年，西部西伯利亞之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由於人口移動每年損失十八—十九%的整個現有的與新訓練的機械人員<sup>⑩</sup>。克拉斯諾汗斯克區的

所有農業的職業代表中，機械人員移動最大；他們佔從事社會生產的離開人數的四分之一，雖然他們佔鄉村定居居民的九點六%<sup>①</sup>。史達羅魯斯克區農業方面各種不同職業的人的外流速率如下：低於人口外流中等速率者為倉庫管理員，送貨員，飼養員—牧人，加油工，馴馬工人等；屬於人口外流中等速率者為會計員，農場管理員，編制生產計劃者—經濟學者，女擠奶員，從事機械化擠奶工作者；高於人口外流中等速率者為獸醫，精巧與附屬企業管理員，施工員，司機，合格的農業技術修理工人，車工，電氣工人，女擠奶員，女養犢員，養豬工人；人口外流速率最高者為拖拉機手—司機，建築人員，工人，從事主要修理工作者，經濟主管，部門主管，農學家與畜牧學家<sup>②</sup>。

## 二、對鄉村與農業之影響

由於人口移動，鄉村人口減少了，老化了，同時外流速率最大者為教育水準最高與最資深的一部分。鄉村人口老化影響到它的自然流動。總人口出生率減少了，而總人口死亡率增加了。在若干情況下，如加里寧省的死亡率已超過出生率。在克拉斯諾諾斯區，如果出生率與死亡率停留在一九六六年之標準，而人口移動終止，那麼在最近十年該區人口將減少十%<sup>③</sup>。

人口移動導致鄉村人口的單獨者與一家兩三口的份量大大增加，同時大家庭的比重相對的降低，一九六七年克拉斯諾諾斯區二十五%的住家是單獨者（其中六十%是退休年齡的人，大體上都是婦女）。只有三點六%的住家是多於五口之家，根據一九五九年之調查，蘇聯全國鄉村多於五口的住家為十三點二%<sup>④</sup>。應該指出的是，在目前情形下，蘇聯研究此問題的人把住家與家庭連在一起，把家庭中只有一個人的當作單獨者。蘇聯的研究者指出，人口移動破壞了大多數的鄉村家庭<sup>⑤</sup>。

人口移動對城市之影響與對鄉村之影響正相反：由於人口移動城市人口增加了，年輕化了，總人口出生率增加了，而總人口死亡率減少了。

人口移動對農業有不利之影響。一九六四年西伯利亞之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維持七十六%的勞動力，而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只維持七十%的勞動力<sup>⑥</sup>。一公頃耕地總產量之改變與農場工人人數之改變相比較，顯示出，在工人減少超過二十%的地方，其一九六四年總產量比一九五九年增加

十一%，而在工人增加超過十%的地方，則其總產量增加六十六%<sup>⑦</sup>。在克拉斯諾諾斯區，鄉村對城市獻出了大部分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幹部，接受調查地區的所有農場都感到勞動力的不足，在某些個別農場這種不足達到被佔用總人數的四十%。接受調查地區的農場尤其急需合格幹部與專家<sup>⑧</sup>。

與諾伏哥羅省史達羅魯斯克區同一類型地區之農業，由於工人缺乏，尤其是合格的工人，以致不能充分利用生產資料而受到困擾。這是俄羅斯全部非黑土地區與蘇聯其他若干自然條件比較不利與鄉村人口大量移動的經濟區所固有的現象<sup>⑨</sup>。蘇聯的研究者認為農業用地面積縮小與勞動力不足有密切關係。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間俄羅斯非黑土地區已使用的農業用地面積減少七百八十八萬公頃，其中耕地四百八十萬公頃；由於積極使用喪失十六%農業用地。而這期間波羅的海沿岸的共和國由於周轉損失兩百多萬公頃或二十四%農業用地<sup>⑩</sup>。

## 三、移居城市後的生活與對城市的適應問題

鄉村居民移居城市後，其工資標準、住宅狀況，與教育水準有若干改變

。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從新西伯利亞省鄉村遷到城市的極大部分移民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工資標準<sup>⑪</sup>。

在史達羅魯斯克區，移居城市的鄉村居民其第一年的生活的物質保障增加了，因為這時候他還來不及把時間與金錢用於提高教育與技能。雖然最近幾年農業的勞動工資大量增加了，但在大體上，鄉村人口的，尤其是農業人口的勞動工資與移居城市者的勞動工資之差數始終是存在的。而且移民在城市住得越久，這個差數就越大<sup>⑫</sup>。

在克拉斯諾諾斯區，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的收入標準亦有差異。鄉村居民私人副業的附加收入遠不能充分補足城市與鄉村居民收入的差異。

相反的，前往城市的鄉村移民的住宅條件不能常常令人感到滿意。以新西伯利亞省而言，甚至那些在城市住了四至七年的人，只有五十五%有自己住所，而其餘的四十五%移民分為下列大約相等的三部分：住在宿舍，住在親戚家，租私人住所<sup>⑬</sup>。

在史達羅魯斯克區，情形也是如此。三分之二的鄉村移民頭五年或是住在宿舍，或是住在親戚家，或是租半間屋<sup>28</sup>。

鄉村移民在城市的社會發展途徑為接受職業訓練與專門教育。在這一方面城市之可能性比鄉村大得多。在城市實際上可以把它們安置到中等技術學校、職業技術學校與高等學校。

根據新西伯利亞研究者的調查資料，一九七〇年間，新西伯利亞省鄉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期間接受專門訓練的人數從十七%增至七十八%。十二%的移民接受高等或不完全高等教育，二十%接受中等專門教育<sup>29</sup>。

在克拉斯諾汗斯克區，從鄉村到城市的六十八點七%的移民提高了自己的普通教育水準，由於在專門學校受訓的結果得到了職業與專門技能，或者比居住鄉村時獲得更高技能的職業<sup>30</sup>。

在史達羅魯斯克區的大多數移民使普通教育的提高與職業訓練相配合。六十八%的移民接受了各種職業訓練。很多移民得到機械人員的職業，包括鉗工、車工與電焊工，其他移民的職業是司機、電氣技術人員、機械技術人員等等，有些移民移居城市後繼續從事原來的職業<sup>31</sup>。

儘管有些鄉村移民在城市獲得職業，提高了工資與教育水準。但絕大多數的移民，尤其是老年人，對城市是不能適應的。根據蘇聯之統計，蘇聯全國一百個前來城市的鄉村移民有八十個至八十二個人離去的，而在烏拉山地區與西伯利亞有九十五個人離去的。

從傳統的閉塞的鄉村社會，移民帶着不明確的被沖潰的界限進入城市社會，並且許多行為標準要求移民放棄許多傳統觀念，摧毀個人傳統的定向行為而採取新的立場。伴隨着這一過程同時發生了不接受若干方面的城市生活方式，發生了或多或少與移民觀點不合的長久的抵抗觀點……：雖然現在鄉村居民比從前更瞭解城市，但在與鄉村移民的城市現實性衝突的情形下，直到現在還埋伏着很多意外事件<sup>32</sup>。

許多移民說明自己遷移到城市是希望改善文化生活條件，但大多數移民所感到滿意的是他們在鄉村也可享受的電影、跳舞與娛樂晚會。

#### 四、人口移動之動機

人口移動過程的第一個細胞——個人的移居行動。為了明白人口移動，必

須明白這一行動之結構。它的最初因素為個人要求改變住處的外來刺激因素；經由遷移到新住處而期望改善或改變某種生活條件，以及擴大生活觀感。這些關於各地生活條件、移居必須費用、新移居地的可能安置、適應困難的個人刺激因素與消息掌握構成了人口移動的內在動機，而這些動機又與個人生活情況（工作、家庭環境、現有經費等）相結合，才採取遷移的決定。然後便離開原住地，遷移到其他地方，在新住地能適應下去或返回原住地。

根據新西伯利亞研究者的意見，生活條件的地區差異是遷移意圖的基礎。當然，由於人們的心理特徵大大的不同，各種個人對解決移動問題所考慮的條件的總和是特別大的。意圖增加個人收入，改善住所與文化生活條件，安置個人生活，增加社會閱歷，體驗困難工作，參加某種廣大建設等都可作為刺激因素。

新西伯利亞研究者指出，人的合理行為的假設不足以解釋人口移動。模仿與向別人行為看齊的因素，以及輿論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很多移民沒有明顯的認清的遷移動機，只是無意識的依附在該範圍所建立的行為標準與一時的風氣。

依新西伯利亞研究者的看法，遷移意圖的具體動機分為下列幾種：不滿勞動內容與勞動條件者二十四點四%，不滿工資者七點六%，意欲繼續接受教育者（自己或兒女的）十六點七%，希望在城市生活者九點五%，由於家庭狀況者七點四%，其他理由的三十四點四%<sup>33</sup>。

研究者指出，絕不要認為，消除了某一動機的客觀理由就可排除遷移的願望。在許多情況下，這一措施不能促使放棄遷移，而只是改變了若干遷移理由。例如，在拉平城市與鄉村居民的生活條件下，推說在城市有更多有興趣的勞動與更好的教育機會的人數增加了。

克拉斯諾汗斯克區的研究者認為，人口強烈移動與下列各項有依從關係：集體農場經濟發展水準，以一百公頃為單位的農業用地總收入的大小，淨收入，勞動工資，居民點的範圍，居民點離地區中心的遠近，道路、文化生活、醫療與商店的有無，集體農場住宅基金的具備等。

#### 五、蘇聯調整人口移動之方法

根據新西伯利亞研究者的觀點，調整人口移動的方法永遠是社會性的，

因為這些方法是以社會關係範圍為基礎，而且是用來影響人的社會行為，它們可以或是帶有非經濟的性質（行政的、法律的或組織上的），或是帶有社會經濟的性質。為了限制從社會觀點而言所不希望的移民流，應採取下列措施。首先是限制前往大城市與若干中等城市的新移民的戶口登記，以法律調整整體農場的移動人數。但這些措施的功用是有限的。調整人口移動的決定性角色是控制社會經濟因素，即控制人的生活條件。由於實行下列經濟措施的結果，可以改變這些因素：資本投資的適當分配，工資基金與社會消費基金的設置<sup>39</sup>。

史達羅魯斯克區研究者對調整人口移動方法的觀點差不多與新西伯利亞研究者的觀點一樣，只有一點不同，就是極力批評關於行政性質的措施，認為那些措施不能保證在所需方面調整人口移動，同時會引起很多不希望的心理影響，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刺激鄉村居民離去的願望<sup>40</sup>。

克拉斯諾斯塔斯克區研究者介紹了很多減少鄉村人口外流的個別措施。大體上它們可以用公式表示出來：為鄉村勞動者建立城市生活水準的生活條件<sup>41</sup>。

蘇聯專家認為，目前調整人口移動最重要的措施只有盡量刺激勞力過剩地區的鄉村人口外流。很多地區的鄉村由於人口很少移動而因此勞力過剩。例如，一九七〇年中亞地區鄉村人口純外流是一千人中有五人，而同一時期在西部西伯利亞一千人中有三十五人。從有效利用勞動力的觀點言，直接對立的相互關係是合理的，可以暫時中止西部西伯利亞鄉村人口的減少與中亞地區鄉村勞力過剩的增加。

據資料顯示，蘇聯為了移民西伯利亞，曾採取了很多獎勵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工資，增加休假及提早退休等。但是離開西伯利亞的人日漸增加。原因之一為西伯利亞的生活費用比蘇聯其他地方高出很多。根據今年一月蘇聯「經濟問題」期刊之報導，「在嚴寒的氣候下，東部地區之生活價值指數比蘇聯歐洲地區要高。根據勞工科學研究所之統計，蘇聯東部地區一家四口的開支與蘇聯南部相比，食物為一二六%，衣服與鞋子一四七%，房租、取暖設備與其他一八八%。平均而言，在東部地區為了保障正常生活條件，必須比蘇聯南部多開支三八%，比中部地區多開支二六%。而東部地區的北方開支還要高。」

## 蘇聯的人口移動

西伯利亞大部分地區都甚為落後。商店裏衣服與消費品的存量不多，在冬天鮮果與蔬菜都見不到。此外，住宅缺乏、住宅設備落後、交通不便、教育機會少等等，都是西伯利亞人口移動的原因。今年一月蘇聯「經濟問題」期刊也談到此一嚴重問題，「一如實際經驗顯示，要想把生活水準的差異拉平，只經由提高工資所收到的效果是不够的，而在某些情況下將導致人口流動性的增大。提高工資標準必須增加物質保障，即必須大大改善消費品之供應，消費品供應標準應不低於蘇聯西部地區。否則提高東部地區工資而不能在當地花費大數目金錢是人口過分移動的另一原因。因此實行蘇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提高與調整工資措施之同時，最有效之方法是改善食物、衣服、鞋子、日常生活與文化設施之供應。」

註①：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八日Moscow News。註②：同註①。註③：同註①。註④：「鄉村人口移動」（由沙斯拉夫斯卡雅主編的集體創作，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一一〇頁。註⑤：同註④第一〇二頁。註⑥：由古他夫也娃等合著的「鄉村人口移動（中部經濟區）」（莫斯科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四十二頁。註⑦：同註⑥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頁。註⑧：史達羅威羅夫著「城市或鄉村」（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十二頁。註⑨：同註④第一三一頁。註⑩：同註④第二一〇頁。註⑪：同註⑥第四十七頁。註⑫：同註⑧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頁。註⑬：同註⑥第六十頁。註⑭：同註⑥第五十七頁。註⑮：同註⑧第六十七頁。註⑯：同註④第八十八頁。註⑰：同註④第九十五頁。註⑱：同註⑥第四十五頁。註⑲：同註⑧第七十一頁。註⑳：同註⑧第七十二頁。註㉑：同註④第二六九頁。註㉒：同註⑧第五十二頁。註㉓：同註④第二六八頁。註㉔：同註⑧第五十二頁。註㉕：同註④第二七二至二七三頁。註㉖：同註⑥第五十四至五十五頁。註㉗：同註⑧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頁。註㉘：同註⑧第五十七至五十八頁。註㉙：同註④第一六〇頁。註㉚：同註④第五十七頁。註㉛：同註⑧第七十五頁。註㉜：同註⑥第一二二頁。